

兩浙作家文叢

永嘉四灵詩集



I222.744

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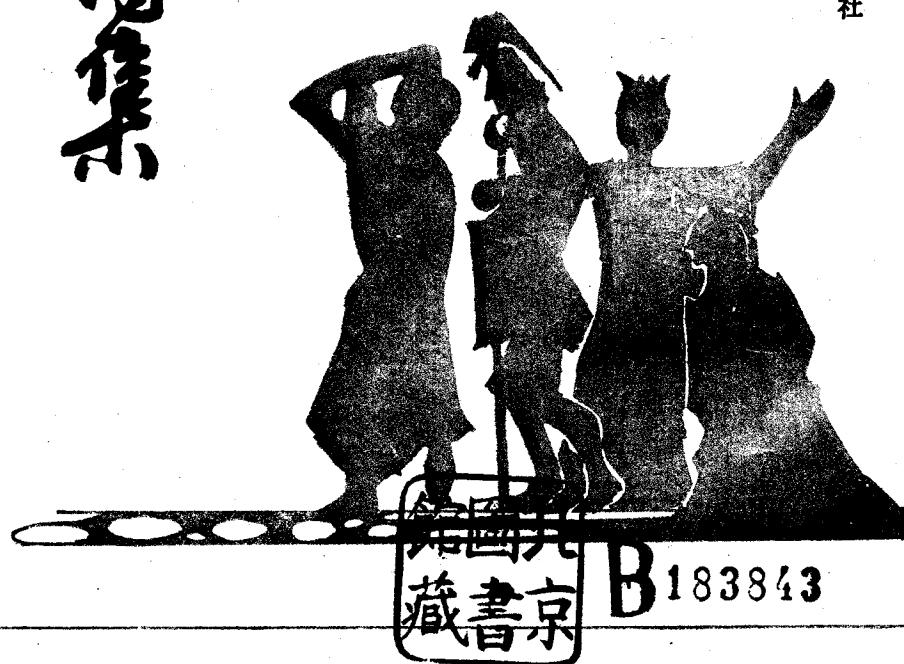
3

# 水滸四大家清集

两浙作家文丛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B48419



责任编辑 孙家遂  
封面设计 任惠安

两浙作家文丛  
**永嘉四灵诗集**

〔宋〕徐照、徐玑、翁卷、赵师秀撰  
陈增杰校点

\*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 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2.125 字数140,000  
1985年3月第一版  
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6,700

统一书号：10347·15  
定 价：2.20 元

## 前言

「四灵」是指南宋四位诗人徐照、徐玑、翁卷、赵师秀。徐照（？—一二二一）字道晖，又字灵晖，号山民。徐玑（一一六二—一二一四）字致中，又字文渊，号灵渊（也作灵岡）。翁卷（生卒年未详）字续古，又字灵舒。赵师秀（一一七〇—一二三〇）字紫芝，又字灵秀，也称灵芝（一），号天乐。他们都是浙江温州人（翁卷为温州乐清人，余三人均温州永嘉人。永嘉即今温州市，宋温州府治所。温州古亦称永嘉郡），字号中皆带「灵」字，彼此旨趣相投，创作主张一致，诗风相近，自成一派，故世称「永嘉四灵」。

四灵的生平身世，我们知道的不多。徐照终生布衣，未尝仕进，过着田园生活，家境贫穷，死后还是靠「朋友裒钱葬」（徐玑《读徐道晖集》）的。善画（赵师秀《喜徐道晖至》诗：「闲成画亦传。」）。四灵中最先亡故。徐玑出身世家，父定曾任潮州太守。玑受父「致仕恩」

(见《水心文集·徐德操墓志铭》)，历任建安(今福建建瓯县)主簿、永州(治所在今湖南零陵县)司理、龙溪(今福建漳州)丞等职。移武当令，改长泰令，未至官而卒。他为官清正，守法不阿，在任职上做过一些有益于民众的事。如在建安安抚麻溪峒民，在永州释放被兵官捕捉的无辜平民，在龙溪禁止豪党侵占陂田等(见叶适《墓志》)。精书法，「无一食去纸笔」，笔法晚年颇近《兰亭》。赵师秀系宋宗室，宋光宗绍熙元年(一一九〇)中进士，尝任上元(今江苏江宁县)主簿、金陵(今南京)幕从事、筠州(治所在今江西高安县)推官。晚年寓居钱塘(今杭州)，「有终焉之志」(《永嘉县志》本传)。嘉定十三年，死在那里。翁卷尝登宋孝宗淳熙十一年(一一八三)乡荐，后来在越帅和江淮边帅幕中供过职(见戴栩《送翁灵舒赴越帅》诗与《乐清县志》本传)。一生落拓江湖，活了六十多岁，四灵中他是最后去世的。

「永嘉四灵」是继江西诗派之后在南宋诗坛上独树一帜的一个诗歌流派。四灵派的出现，从文学方面讲，成因有二：一是不满于理学家的诗论，二是「以矫江西之失」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清苑斋集》)。这前一个成因往往不为评论家所注意。

叶适(水心)是四灵诗派的倡导者和鼓吹者，四灵均出自他门下(见吴子良《林下偶谈》卷四)。叶适在《徐道晖墓志铭》中说：唐代近体诗源于齐、梁「永明体」，讲求声律辞采。这种

「五色彰施，律呂相应」的唐体，「厌之者」却斥为「纤碎而害道，淫肆而乱雅」。徐照等人「复言唐诗」，「发今人未悟之机，回百年已废之学」，因此是值得「词人墨卿」引以为快的。（案：叶适、四灵及下引南宋诸人所谓「唐诗」、「唐体」，「唐」均指中、晚唐而言）这里所谈厌恶唐体的「今人」，即隐指理学家。明徐学聚《两浙名贤录·赵师秀传》中对此有更具体的记述：

自乾、淳以来，濂、洛之学方行，诸儒类以穷经相尚，诗或言志，取足而止，固不暇如昔人体验声病律吕相宜也，潘柽出，始创为唐诗；而师秀与徐照、翁卷、徐玑寻绎遗绪，日锻月炼，一字不苟下，由是唐体盛行。「濂洛之学」即周（濂溪）、程（程颢、程颐）道学，亦即理学。宋孝宗乾道、淳熙年间，程朱理学大行。反映在文学上，理学家提出「以道学为诗」，认为诗是「明道」、「明理义」的，文辞不过是「末技」；只要理义好便是好诗，此外更不存在什么「工拙之论」（朱熹《答杨守卿》云：「然则诗者，岂复有工拙哉！」）四灵反对这种理论，他们以诗「自吐性情」（见《四库提要·苇碧轩集》引），直抒感受，认为「以浮声切响、单字只句计巧拙，盖风骚之至精也」；而那种不加锻炼，「连篇累牍，汗漫而无禁」的作品则是不能「名家」的（《水心文集·徐文渊墓志铭》）。理学家说：「诗固可以不学而能之」（朱熹语），因

而卑视晚唐苦吟派，斥之曰：「可惜一生心，用在五字上！」（《二程语录》卷十一引）。而四灵所崇奉服膺的却正是惨淡经营，刻苦推敲的晚唐贾岛、姚合、方干诸人，他们自己也是「磨砻双鬓改，收拾一篇新」（徐玑《书翁卷诗集后》），「传来五字好，吟了半年余」（翁卷《寄葛天民》）。理学家推崇魏晋以前的古诗，排斥新体律诗，提出要恢复「古制」；而四灵所刻意求工的却是唐代的律体。从上述可见，四灵的创作主张同理学家的诗论是针锋相对的。在当日「贵理学而贱诗」的风气下，诗坛上有不少粗制滥造之作，所谓「间有篇咏，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」（《后村大全集》卷一《恕斋诗存稿跋》）、「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」（同前卷九四《竹溪诗序》）。这种「贱诗」的观点和衰败的诗风，当然是把吟诗当作一生事业的四灵所不能接受并要加以反对的。受四灵影响的江湖派诗人刘克庄说：「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，惟永嘉四灵复为言苦吟。」（同前卷九八《林子园诗序》）刘克庄所说是符合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况的。四灵正是慨于「理学兴而诗律坏」，所以他们要提倡唐体，复言苦吟，以图矫正。至叶适之支持四灵，尚有其哲学上的根源。叶适的「永嘉之学」与程朱理学相对立。他对理学家的文学观同样也持批判态度。宋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卷上云：「诸老率性理，卑艺文。朱氏主程（二程）而抑苏（苏轼），吕氏《文鉴》多去取朱意，故文字多遗落者，极可惜。水心叶氏云：『洛学兴而文字

坏。」至哉言乎！」（元刘埙《隐居通议》卷二亦记载叶适此语。上引刘克庄「理学兴而诗律坏」的话，明显地是接受了叶适的观点）即认为理学家重道轻文的理论，败坏文风，妨碍文学的发展。叶适鼓吹宣扬四灵的主张，同他哲学上的斗争正是桴鼓相应的。

当四灵之际，风靡一世的江西诗派已渐趋末流。江西派「资书以为诗」、拼凑襲积故典和生硬拗捩的作风，也是四灵深为不满的。他们「厌傍江西篱落」，而要独立门户，自辟蹊径，从江西派所不喜欢的中、晚唐诗家入手，刻意求新。叶适说：「往岁徐道晖诸人，摆落近世诗律，敛情约性，因狭出奇，合于唐人，夸所未有，皆自号四灵云。」（《题刘潜夫南岳诗稿》）这段话说出了四灵的创作宗旨。赵师秀选贾岛、姚合诗二百余首为《二妙集》（二），又选刘长卿、钱起、周贺、李嘉祐、方干等七十六家诗二百二十八首为《众妙集》，作为学习的榜样。四灵之宗奉贾、姚诸人，除了他们同贾、姚在生活际遇、思想情趣上都有共同之外，还出于另外的考虑。对此叶适曾作过说明：江西派「以杜甫为师」，但昧于「格有高下，技有工拙，趣有浅深，材有大小」，所以并没有学到什么；贾、姚等人虽才气不大，却以「苦吟」名家。与其「徒枵然从之而不足充其所求，曾不如脰鸣吻决，出豪芒之奇，可以运转而无极也。」（《徐斯远文集序》）走贾、姚的路，只要下功夫，「因狭出奇」，庶几终可「有获」。这大约是四灵及后来江湖派这

一群自感才力薄弱而又欲有所建树的诗人们的共同想法。这也是四灵体在当时能广为流行的一个原因。四灵的诗与江西派不同，他们很少使事用典，多采取白描手法，诗风显得较为平易。简约清淡，「贵精不求多，得意不恋事」（《隐居通议》卷十《刘五渊评论》），是他们的创作准则和目标。徐玑《凭高》诗说：「客怀随地改，诗思出门多。」《六月归途》诗说：「诗句多于马上成。」说明四灵的视野，也比那些一味模仿、翻弄书籍、持撝章句的江西派诗家，要来得开阔一些。不过，四灵的创造力毕竟很有限。究其实，他们同江西派只是宗奉不同，作诗的方法倒并无多大差异。江西派视作金科玉律的「点铁成金」、「夺胎换骨」法，四灵也用得很熟。如《诗人玉屑》所举翁卷「移花连旧土，买石带新苔」、赵师秀「忆就江楼别，雪晴江月圆」等比较得意的句子，就是从唐人成句中点化出来的；虽其中不乏青出于蓝者，究竟「出于假借」，不是正路。

四灵以诗作为陶写性情的工具，他们的作品主要是抒发个人的感受，集内大都为流连光景、吟咏田园生活、抒写羁旅情思以及应酬唱和之作。总的来说，作品社会意义不大，缺乏深广的内容和时代风云之气。这大约是那个时期作家的通病。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、思想情志和处世态度所致，同时也是社会环境使然。当光宗、宁宗朝，宋、金在军事上处于相对稳定

状态，边事稍息，统治集团更加苟安于现状，再也无锐志恢复中原。士大夫沉湎诗酒，歌舞升平，象陆游那样的金戈铁马、慷慨激昂的战斗篇章在诗坛上几乎销声敛迹了。在这种萎靡的社会风气下，不可能产生雄劲刚健的文学。

不过，四灵对于世事并没有完全忘怀。赵师秀原是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人，南渡时徙居永嘉，因此诗中往往流露出怀念故国之情：「北望徒太息，归欤寻故园。」他对统治集团偏安江左，抱残守缺，不图恢复的国策是深为不满的。「听说边头事，时贤策在和！」（《抚栏》）尚属委婉的讥讽；「慷慨念时事，所惜智者昏。砭疗非无术，讳疾何由论！」（《九客一羽衣泛舟，分韵得尊字，就送朱几仲》）已经是激烈的抨击了。徐玑《传胡报二十韵》有云：「晋赵非殊异，山河本浑全。人心方激切，天道有回旋。」希望出现象汉宣帝那样的中兴之主和诸葛亮那样的贤才，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。翁卷和赵师秀各有《赠张亦》一首，写出了在「罢兵」的妥协政策下，「男儿」不能建立功业、报国无门的愤慨。

四灵比较接近社会下层生活，熟悉民情风俗，因此能写出一些反映现实的诗作。如徐照《促织词》：「丈夫力耕长忍饥，老妇勤织苦无衣。」《缫丝曲》：「荻箔争收茧，瓢轮斗卷丝。未充身上著，先卖给朝饥。」翁卷《东阳路旁蚕妇》：「相逢却道空辛苦，抽得丝来还别人！」同

情民生疾苦，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，都很真切。徐照、翁卷的田居生活也并不美满，时时陷入困境。「难语伤时事，无成愧野翁」；「耕桑犹罄橐，何事可营生！」（徐照《和翁灵舒冬日书事三首》）亲尝稼穑之艰，包含着不少辛酸。这样的田园诗就不是过着安闲舒适别业生活的王维、储光羲诸人能写得出来的。四灵集中还有一些描写农村情景和渔家生活的篇什，请看徐照的《渔家》：

阿翁年纪老，生计在纶丝。野水无人占，扁舟逐处移。数鳞新柳岸，一笛小儿吹。有酒人家醉，公卿要识谁？

干净利落，清新可喜，富有情趣。结句表现了对权门的蔑视。这种不事权贵的傲岸精神，也反映在徐照的《畏虎》一诗中。

四灵专攻五律。其律体多咏景物，写萧散野逸之趣，追求一种平淡简远的情调。注重字句的锤炼和对偶声韵，《四库提要》说：「专以炼句为工，而句法又以炼字为要。」于律诗中间两联尤加意「磨莹」。如：

风顺眠听角，楼高望见船。（徐照《永州寄翁灵舒》）

月生林欲晓，雨过夜如秋。（徐玑《夏日怀友》）

轻烟分近郭，积雪盖遥山。（翁卷《冬日登富览亭》）

蚕月人家闭，春山瀑布多。（赵师秀《德安道中》）

都是格律精严，真切浑朴的秀句，为人传诵。再象赵师秀的「野水多于地，春山半是云」（《薛氏瓜庐》），写江南山水，寥寥数笔，而有传神之妙，难怪在当时即被人绘成画轴（三）；徐照的「不来相送处，愁有独归时」（《送徐玑》），善状人情，属对工整而不露痕迹；徐玑的「秋风分手地，霜叶满江城」（《年家生张主簿经过相寻，率尔赠别》），也写得情景交融。这些简练生动，通俗晓畅的诗句，比较江西派艰深晦涩之作，自然要一新耳目，受人欢迎。

四灵的七绝数量不多，但少而精，新颖灵巧，圆美自然，刘埙说是学王安石的（见《隐居通议》卷十一《半山绝句悟机》）。如徐照《舟上》，徐玑《新凉》、《秋行二首》、《春晚》，翁卷《乡村四月》、《南塘即事》、《野望》，赵师秀《数日》、《约客》等，宋人绝句中均可称上乘。四灵古体气格较弱，然亦时有佳构，如徐玑《述梦寄赵紫芝》诗：

江水何滔滔，渡江相别离，揖子客舍前，对子衣披披。问子何所为？旅客未得归。执手一悲唤，惊觉妻与儿，起坐不得省，清风在帘帷。平明出南门，将以语所知。过子旧家处，寒花出疏篱。萧萧黄叶多，袅袅归步迟。子去不早还，何以慰我思？

写怀友之思，语真情切。穿插「清风」、「寒花」两句，更添情致。七律当推赵师秀最擅胜场。他的《孤山寒食》，通篇气韵清雅，怀抱自见。《秋夜偶书》中「辅嗣《易》行无汉学，玄晖诗变有唐风」一联，用事精切，感慨至深，而通篇又复苍凉浑成，自占地步。象这类作品，都不能只从字句着眼来评骘，可说已经越出贾、姚的藩篱了。

四灵诗的缺点是：格局较小，不善变化，缺乏深厚阔大的气象。集中尽管不乏警策之句，但是象上举二首七律那样通篇俱佳之作，却属少见。还有一些诗语僻意浅，庸俗乏味。四灵反对理学家的诗论和江西诗派，打出「唐风」的旗号，颇有改革诗律的革新之志；但由于他们脱离时代，未能紧密结合现实生活，而且「取径太狭」，止依傍贾、姚数人，不复追溯「开、宝遗风」，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创作上不可能取得突出的成就。正象严羽所批评的：「祇入声闻、辟支之果（佛教小乘），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哉！」（《沧浪诗话·诗辩》）

四灵诗在当时曾经风行一时，取得了与江西派「相抵轧」（《隐居通议》卷十）的地位。赵汝回说：「水心先生既啧啧叹之，于是四灵之名天下莫不闻。」（《南宋群贤小集·瓜庐诗序》）四灵之冠的赵师秀有「五言专城」之誉（葛天民《无怀小集·简赵紫芝》）；翁卷亦负盛名，「渐多来学者」（徐玑《书翁卷诗集后》），「世以晚唐诗名者」，「遥拜之为宗师」（黄震《黄氏

日抄》卷六八《读水心文集》)。受四灵熏陶，不惟「永嘉多诗人」(刘克庄语)，出现了一大批追随者，诗风蔚然大振(「四」；而且影响所及，下开江湖一派。严羽说：「江湖诗人多效其体。」刘克庄说：「旧止四人为律体，今通天下话头行。」(《后村大全集》卷十六《题蔡生主簿诗卷》)对江湖派的出现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。所以全祖望在《宋诗纪事序》中分析宋诗源流演变时，指出四灵之峙起乃「宋诗又一变」，对其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恰当的评价。

四灵诗，徐照尝有家刻本行世(《水心文集》卷八有《徐师垕广行家集，定价三百》诗，师垕，照子名)，久佚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十载「徐照集三卷，徐玑集二卷，翁卷集一卷，赵师秀集二卷，别本天乐集一卷」，今亦不见。叶适编有《四灵诗选》，选诗五百篇，江湖陈起(芸居)予以刊行(见《南宋群贤小集》第四册许棐《融春小缀·四灵诗选跋》)。今所传明潘是仁(切叔)刻《宋元四十三家集》之徐照《芳兰轩诗集》、徐玑《二薇亭诗集》、翁卷《苇碧轩诗集》、赵师秀《清苑斋诗集》，合计诗四百六十二首，即或陈氏刊本之旧。清顾修读画斋重刻《南宋群贤小集》，鲍廷博知不足斋影写《南宋八家集》(有上海古书流通处景印本)之四灵诗，皆取诸潘刻(顾、鲍本并附以补遗)。后来乐清郑见田息菴园刊《四灵诗集》、冒广

生永嘉诗人祠堂丛刻《永嘉四灵诗集》，亦均从此出。丁福保上海医学书局《永嘉四灵诗》，又系据冒本翻刻。以上诸本连同补遗在内，计徐照诗一百十七首，徐玑诗一百零八首，翁卷诗一百三十八首，赵师秀诗一百四十一首，共计五百零四首，显然都不是全本。

钱牧斋（谦益）《绛云楼藏宋椠》《四灵诗集》（钱氏有《书<sup>入</sup>四灵诗集》诗，见《牧斋初学集》卷十三），火烬后仅存前半部，归汲古阁毛氏。此残宋本《四灵诗集》计甲、乙、丙、丁四卷，甲、乙、丙三卷为徐照诗，丁卷为徐玑诗上卷，与《书录解题》卷数合。徐照诗计二百五十六首，较潘刻《芳兰轩集》多出一百五十一首；徐玑诗上卷计九十七首（原本九十八首，除去《十日》重出一首），为潘刻《二薇亭集》所无者五十六首。陆心源尝补录顾本所不载之二徐逸诗四治让玉海楼均有钞本（孙本录有何焯康熙辛巳题跋）。陆心源尝补录顾本所不载之二徐逸诗四卷，刊入《潜园总集·群书校补》中（见卷九十至九十三）。一九二五年南陵徐乃昌所刊《永嘉四灵诗》（实止二徐诗）与一九二八年永嘉黄群敬乡楼丛书《芳兰轩诗集》《二薇亭诗集》，即均据孙氏玉海楼钞本校刻（徐玑诗各附补编）。

现存徐照诗二百五十九首，徐玑诗一百六十四首，翁卷诗一百三十八首，赵师秀诗一百四十一首，共计七百零二首。这次整理，二徐诗以黄群敬乡楼本为底本，翁卷、赵师秀诗以潘是仁宋

元名家集本为底本，校以顾修本、鲍廷博本、陆心源本、郑见田本、冒广生本、徐乃昌本。并参考宋刘克庄《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》（棟亭十二种本，简称「千家诗」），元方回《瀛奎律髓》（清李约斋刊误本，简称「律髓」），《永乐大典》（中华书局影印本），明蔡琰《东瓯诗集》，赵諫《东瓯续集》（弘治十六年刻本，简称「诗集」「续集」），吕留良、吴之振、吴自牧《宋诗钞》（吴氏鉴古堂本），清曾唯《东瓯诗存》（乾隆刊本，简称「诗存」）。此外，清吴曹直、储右文《宋诗选》（康熙二十六年刊本），清王史鑒《宋诗类选》（康熙五十一年刊本，简称「类选」），清康熙《温州府志》（简称「府志」），清厉鹗《宋诗纪事》（乾隆十一年刊本，简称「纪事」），清管庭芳《宋诗钞补》（涵芬楼校印本）等亦间取以参校。

今兹校记，凡校改之处，酌加说明；异文择其有参考价值者列入校记。底本文字属明显误讹，为避免烦琐，即予径改（如徐照诗「只恐君为禄仕催」，「禄」原误作「绿」之类），他本误而底本不误的，一般不出校。前人所辑补遗诗，经查核后，予标明出处。兹又从宋李弁集句《梅花衲》、宋释绍嵩《江浙纪行集句》、《全芳备祖》和《说郛》中辑得若干逸句，并录于后。又从《阳春白雪》辑得徐照词五首附于《芳兰轩诗集》后。

徐玑集原补编诗，从潘刻《二薇亭集》补录者，今标作下卷；潘本所无而辑自他书的，仍称

补遗，以示分别。又巩诗上卷《十日》一首即同卷《溪上》诗，属复出，今予删除；原补编中《吾庐》诗，与翁集补遗《幽居》重，已归翁集，此即不录（为备查检，予保留篇目。详各该诗校记）。潘本翁、赵集原各按体裁分卷，现予合并。

附录编为四个部分：（一）志传序跋；（二）诸家题咏酬赠；（三）诸家评论（选辑宋至清有关四灵诗的论述）；（四）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四灵诗批语。供读者参考。

本书在校点中曾得到吴鹭山先生的指教，温州市图书馆给予借阅之便，谨在此致谢。点校中的错误和疏漏之处，祈请读者指正。

陈增杰

一九八三年二月于温州

〔注〕

〔一〕翁卷《苇碧轩集》有《同赵灵芝、杜子野游豫章总持寺》诗（杜子野名耒，号小山，即《梅祠诗话》所载同句法于紫芝者），元刘埙《隐居通议》卷十一《半山绝句悟机》「四灵」